

专题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亚洲和世界

世界政治变迁与中国对外战略思考¹

王缉思

2011年初北非中东出现的社会政治动荡，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揭开了21世纪下一个十年的序幕。姑且不论这几场动荡的性质和根源，单就形式而言，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国家依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但族群、教派、各类社会团体以至个人（尤其是掌握了网络通信工具的青年一代）都将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仍将是影响国际安全的关键因素，而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干预力度在加大，并呈现日益复杂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内部政治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一大变量，成为中国思考和制定未来对外战略时不可或缺的考量。

近年来，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的迅速增长，不仅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成为它们制订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个因素，也同时对中国人观察国际事务的心态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手段产生了明显影响。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成为决策部门、思想库和相关学者在研讨中国对外战略调整时的另一重要考量。

基于此，本文的两个主要着眼点，一是世界政治变迁的特征和趋势，二是中国在当今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定位”问题。最后，本文将就中国的大战略选择略抒己见。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1 本文在以下几篇拙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1）王缉思、唐士其：“30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47期，2010年3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编印；（2）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3）王缉思：“中国大战略求索”，《东方早报》2011年2月28日—3月2日连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昊为本文的完成提供了极大帮助，作者在此深深致谢。

一、世界政治变迁的基本特征

当前中东变局的出现，既有偶发因素，也有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广阔背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推广，各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也日趋加深。相比起观察者相对熟悉的地域和国家特征来说，世界政治变迁的时代和阶段性特征更值得研究。

过去3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

过去3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那些已经采纳了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艰难地探索民主的“本地化”以巩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断遭到质疑。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公共社会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等）凸显，宗教与

民族问题政治化，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都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且重新定义着世界政治的内涵。总结30年来世界政治的变迁，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一个国家民主与自由的程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志之一。个人独裁、家族统治、信息封闭、政府工作不透明、人权遭到践踏，在任何国情和政情下都很难加以辩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一直稳定，即使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或一般性社会危机，也没有对政治体制造成根本冲击。1970年代时，采用竞争性多党制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是少数，到1990年代后期已经占绝大多数。今天，即使像缅甸、伊朗这样一些被认为是独裁专制的国家，也在表面上维持着多党政治或普选制。从长远来看，非西方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过渡表现出某种不可逆转的势头。但需要注意的是，伊斯兰国家中尚未出现一个完全成熟的民主体制，中亚国家在短期内从模仿西方民主回归到更为熟悉的强人政治，而保留着西方文化传统的中东欧国家却能很快适应多党民主。这说明：一方面，宗教、文化与政治传统对民主化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程度同民主化出现的迟早没有必然联系，但同民主化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

第二，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异的诉求和特色。发达国家的传统民主制显出一些缺陷和弊端，比如少数人的权益在“竞争性多数决”制度下遭受牺牲，于是“共识民主”和“慎议民主”应运而生。西方国家

也在选举制度、议会制、中央政府同地方的分权、公众舆论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进行种种改革。冷战结束后,广大非西方国家得以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虽然出现了美国使用武力“解放”伊拉克和阿富汗、强行推动当地“民主化”的情况,一些国家的“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也有西方势力挑动的背景,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来说是内生、自主、反映国内民众普遍政治要求的。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政治对立,等等,并不能否定民主本身的价值和各国“试错”努力的意义。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都是丰富多彩的。民主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第三,在公民自由和民主制度之外,稳定与秩序也是各国政治所追求的目标。经验证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是一个天平的两头,必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过度的个人自由和小群体自由会导致社会分裂、价值观扭曲、公共生活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还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个人私欲极度膨胀的恶果。在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上述问题比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法治不够健全,但人们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和价值观的影响面前,不断增强的欲望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的可能性。在一些中东、非洲国家,部分公众的不满通过激烈的形式表达,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受到威胁;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又往往转变为超越法治的强权,压制了个人自由、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利。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维持这一动态平衡的砝码,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抑或政教合一体制的回归(例如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伊朗),都未能为社会公正提供完整的答案。

第四,在国家同社会、政府同市场的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但尚未产生能真正与之抗衡的革命性力量。减少国家对社会干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曾被认为代表着普世价值;但过去十多年来,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迷信遭到普遍怀疑和否定。但是,如何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寻找一种合适的

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来说是内生、自主、反映国内民众普遍政治要求的。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都是丰富多彩的。民主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经验证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是一个天平的两头,必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

在国家同社会、政府同市场的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但尚未产生能真正与之抗衡的革命性力量。

平衡, 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全球范围, 在很多国家内部, 贫富悬殊在急剧扩大。环境恶化、生态失衡、金融动荡、社会分裂, 都呼唤政府发挥克制贪欲、维护公正的社会平衡器作用。但是, 如果政府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 决策过程不透明, 其权力越大, 社会失衡就越严重。“第三条道路”难以找到实质的精神内涵与政策支撑, 原因即在于此。20世纪初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思想, 以终结资本主义统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远大目标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 在21世纪初如同空谷足音。以推翻邪恶的美国资本主义霸权为表面目标的零星暴力活动, 被贴上“恐怖主义”标签, 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所谓“反全球化运动”, 亦只能由缺乏坚实思想后盾、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的乌合之众所推动。针对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 目前受制于政府间静悄悄的合作、竞争与交易, 而不能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公民社会的成长, 正在超越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民国家的界限, 成为纠正全球社会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和动力。

第五, 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公民社会的成长, 正在超越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民国家的界限, 成为纠正全球社会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和动力。在全球范围内, 和平、环境、人权等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分量, 成为每一个国家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之同步的, 是国家之外的新的社会认同, 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 以及出于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担忧所形成的观念认同和利益认同。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球意义上, 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以国家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专制, 而是软性的、国家以外的社会认同。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和公民效忠对象, 但仔细考察世界政治史和思想史便不难发现,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并非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例如在若干中东和非洲国家, 相当多的民众对自己的家族、族群和教派的认同, 超过了对传统主权国家的认同, 于是发生了苏丹的一分为二, 而利比亚等国也存在分裂的危险。

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但在这个时间段内, 世界历史似乎已经实现了一次螺旋式的上升。与冷战时期相比, 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多姿多彩, 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为不确定。世界正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就是一个例子。面对海啸、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 面对越来越凸显的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 国家如何实现善治? 世界如何实现共治? 人类如何应对共同挑战? 最近30多年的历史还说明, 苏联模式固然已成为不会再重演的历史, 而今日西方也无法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提供现成的模式和答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点燃了新的希望, 但一切皆在探索阶段, 其普世意义尚待历史考验。在这一意义上, 旧的历史确实已经终结, 新的世界历史也许才刚刚开始。

二、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一直在“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与世界关系正经历着似乎不断加速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中国不断地拷问自身的“国际定位”或“国家身份”。在上述世界政治的宏大背景下，如何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认清“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我们思考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战略选择的重要前提。

第一，从国家实力层面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是否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进而在世界上实力仅次于美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同日本相比，中国不但人口众多、领土广阔、经济规模宏大，而且国防力量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它，又掌握了核武器。可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地缘战略优势和地缘经济优势都已超过日本。因此，说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应是可以普遍接受的观点。这里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于日本的综合“硬实力”虽然逊于中国，但它是同美国结盟的发达国家，并以此弥补了它在地缘战略中的劣势。在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文化教育、科技水平等方面，日本远高于中国，在亚洲的文化软实力也不弱于中国。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日本民族凝聚力甚强，政治体制坚固，社会长期稳定，生态环境优良，即使在过去20年经济持续低迷、政府频繁更迭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政治动荡，在前所未有的地震海啸冲击下也没有惊慌失措。日本的“稳”与中国的“快”、日本的“质”与中国的“量”，形成了鲜明对照，互有所长。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轻视日本的实力地位，将会犯重大错误。

同样不能轻视的还有欧洲。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任何单个的欧洲大国，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规模同美国不相上下，欧元已是堪与美元相竞争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政治影响同欧盟的差距还很大。因此，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经济虽已是世界第二，且发展势头良好，但仅据此认为中国实力已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二，过一二十年即可与美国平起平坐，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特别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滞后，在国际舆论中声音仍较微弱，远远谈不上“世界第二”。对于中国的全球实力定位，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不过，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和俄罗斯，在实力方面也各有千秋。

中国经济虽已是世界第二，且发展势头良好，但仅据此认为中国实力已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二，过一二十年即可与美国平起平坐，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二，从地缘战略角度看，中国地处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亚洲（即不包括西亚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所谓“远东”）的中心位置，随着同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中心，在本地区经济发

展中的“领头羊”作用超过美国和日本。中国也参加了东亚地区的几乎所有区域性经济组织，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成员。不过，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却是另一番处境。中国没有同周边任何国家结成政治或军事同盟，却与日本、印度、越南等邻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领土或领海纠纷。美国主导的“轴辐同盟体系”在

中国有对亚洲的地理认同，也逐渐有了经济认同，但却难以建立政治认同，无法作为亚洲的“领导者”或“代言人”的面目出现。

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格局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这些军事安排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种情况，使中国无法像德国、法国或巴西那样，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代表本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言。换言之，中国有对亚洲的地理认同，也逐渐有了经济认同，但却难以建立政治认同，无法作为亚洲的“领导者”或“代言人”的面目出现。虽然一些中国人热衷于谈论“东方文化”或“亚洲文明”，但中华文明（更确切地说是汉文明）同印度文明、波斯文明、日本文明等同属亚洲的文化

体系，除了都有别于欧美文明以外，相互之间却是千差万别。因此，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国家之一，而不是超乎其他大国之上的“领导者”。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固然正迅速向全球扩展，但无论从任何方面看，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都难以同美国这个唯一的全球大国平起平坐。

第三，从国家政体属性看，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政治经济制度、政治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独特，加之处于深刻而长远的改革进程中，其前进道路上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中国尚未完全实现领土统一，面临民族分裂威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和谐因素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非常缓慢。在国家财力充足、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人均收入低，贫富悬殊大。在政治体制稳固的同时，制度创新能力较弱，社会凝聚力有待增强。在主流意识形态鲜明、宣传工作主旋律突出的同时，社会思潮和舆论日益多元化，政府部门需时刻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政治渗透。出于国内国际方面的种种考虑，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多党制、民主化变革和国家分裂采取同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上述特殊国情与国策，说明中国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仍然十分巨大，而且看不到缩小的趋势，中国也因此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异类”。

第四，所谓的中国“国际定位”，其实主要指角色定位，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而角色定位又受制于上述三方面定位（即实力定位、地缘战略定位和国家政体属性定位）。例如，中国的实力定位决定了中国不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出于自身利益和力量对比的考虑，中国接受了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国际规则，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日益增长的国力使中国得以在国际组织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也承担了更多的外援、维和等国际责任。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周边国家所投入的政

治经济资源和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政体属性,则决定了它受到西方所倡导的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政治压力,对之采取抵制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由国际角色定位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能否成为其他国家学习效仿的“模式”。虽然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讨论十分热烈,但中国官方无意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温家宝总理甚至在2011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直言没有所谓“中国模式”。我向来认为,中国的发展经历与经验还不能上升为一种“模式”,因为这条道路还在艰苦探索之中,尚未完全成型,更未完全成功。世界上确实有些国家想学中国,但中国这一套体制,没有一个国家学得了。

当然,上述几方面的定位是相互作用的,不可能做明确分割。简言之,中国的“国际定位”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1)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发达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还有很大差距;(2)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3)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领土尚未完全统一,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4)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这些看法主要是从“实然”而非“应然”的角度做出的基本判断,但我认为,至少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处境和“身份”也将大抵如此。

中国的发展经历与经验还不能上升为一种“模式”,因为这条道路还在艰苦探索之中,尚未完全成型,更未完全成功。世界上确实有些国家想学中国,但中国这一套体制,没有一个国家学得了。

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对外战略

当思考和分析中国的对外战略时,世界政治的特点及中国的国际定位无疑都是需要首先加以判断的决定性因素。在20世纪50—70年代,世界政治笼罩在美苏争霸的阴影之下,第三世界则还处在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称之为“非殖民化”)的高潮之中;中国的国际定位,简单说来是苏联模式色彩浓厚的东方大国、国际秩序的“造反派”、被迫封闭的穷国。当时的中国对外战略,号称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的“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也就理所当然了。今天,无论是世界政治还是中国的国际定位,与几十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都必须至少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该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是什么?该国如何妥善、有效地应对这种外部威胁?在毛泽东时代的中

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都必须至少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该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是什么?该国如何妥善、有效地应对这种外部威胁?

国，对外关系中的核心利益（当年还没有这个概念或提法）是革命政权的稳固，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是美国或者苏联（有一段时间是美国和苏联），应对威胁的主要手段，除了军事斗争以外，外交上是努力结成反美或反苏（或同时反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

当前，中国官方对于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和认知是清晰、连贯的，同时也是具有高度共识基础的。与“核心利益”紧密对应的政策手段和战略选择决定了这一概念不应轻易改变、随意阐发。

当前，中国官方对于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和认知是清晰、连贯的，同时也是具有高度共识基础的。与“核心利益”紧密对应的政策手段和战略选择决定了这一概念不应轻易改变、随意阐发。2010年12月，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题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署名文章中着重说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维护的“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戴秉国的文章没有将国界以外的任何地域或问题同“核心利益”的概念相联系。此前的几个月里，中国某些评论人士将南中国海和朝鲜说成是中国的“核心

利益”。这些未得到任何官方授权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疑惑，其负面影响至今仍未全部消除。

国家核心利益确定后，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何方，就成为对外战略中的首要问题。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外部威胁往往是另一个国家。但是，当今世界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后值得注意的一个国际政治现象是：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土耳其等新兴国家，都没有在官方声明中，将任何一个国家视为自己最大的外部威胁，更没有指定哪个国家是敌国。当今世界上，尽管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外部威胁，但确定敌国的国家寥寥无几。

美国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将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还曾经将伊朗、伊拉克、朝鲜称为“邪恶轴心”。但是，奥巴马政府对外部威胁做出了同布什政府不同的判断和表述。2010年5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当前美国面临的威胁不是一个敌对的扩张主义的帝国，而是多样化的挑战，从暴力极端分子的松散网络到蔑视国际规则或内部濒临崩溃的国家。除了传统战场上的敌人，美国现在还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不对称威胁，比如针对美国对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依赖的威胁。”可以确定地说，尽管美国战略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对美国构成挑战甚至威胁，但是当今美国政府和政治主流并没有将中国界定为敌国（enemy country）。

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何方？许多中国观察家都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来自美国”，或者更宽泛地说，来自西方。一些人还认为，美国就是中国的敌国，对这一点不容置疑，否则就是“敌我不分”，甚至是“卖国”。这是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需要划清三条界线加以澄清。

第一条界线是，国家是否在客观上受到某个或若干敌国的威胁，同国家是否“需要”一个“敌国”来巩固内部秩序，是不同战略范畴、不同政治范畴的两个问题。孟子说过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回答的是后一个问题。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坦言美国“需要”一个强敌，以巩固国家和文化认同。他说，“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相异、而在军事上又有足够能力对美国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可以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人主张以突出外部强敌威胁来达到内部政治目标，并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或者政策。一些中国观察者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推理是：分清敌友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问题；既然美国是敌人，那么美国的盟友如日本自然也是敌国或敌对势力，世界上的反美力量就应该是中国的朋友或盟友。

对于亨廷顿这样的思想者来说，将中国界定为敌国无须论证其战略意图和对外政策走向。类似的是，对于认为“中国需要敌国”或“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的思想者来说，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世界政治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都同他们的判断不相关。但是，中美两国是否已经成为敌国，或最终将成为敌国，需要做出另一个层次的战略分析。

第二条界线是，一部分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敌国，并不等于美国决策者和政治主流将中国界定为敌国，并将美国的长远战略置于中美互为敌国的判断之上。同样，以美国为敌国的思想，也不能代表中国决策者和政治主流的外交思想。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确认“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长远目标，这显然同“中美互为敌国”的定位截然相反。

第三条界线是，美国构成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政治威胁和经济竞争，不能等同于美国是中国的敌国，也未必等同于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外部威胁。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持排斥和贬损的态度，西方政界人士对达赖喇嘛和新疆分裂分子有所同情甚至支持，美国持续对台（湾地区）军售，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安全压力，美国商界和国会对中国发起“货币战”和“贸易战”，都是需要认真应对的挑战。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目标、改善民生的社会改革、提高教育科技水平的艰苦努力时，就会发现一幅十分不同的图景。

中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冷战时代，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年代，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是不同的。在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紧迫任务的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是全方位的，较前更为复杂，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峻。经济领域的挑战有国际金融

在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紧迫任务的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是全方位的，较前更为复杂，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峻。

动荡、部分国家的经济衰退及其带来的出口市场萎缩、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在国家安全领域有领土领海争端尖锐化、海上军事冲突的危险、周边国家的核武装与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等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能源短缺和原料价格上涨、气候变化、海外公民和企业的安全、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等。当前的中东乱局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也具有多样化的性质。与此同时，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远比20年前更为紧密、深入，内外挑战相互交错、相互转换，防范与应对难度日益增大。中国要将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转化为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政策手段，亦有待时日。所以，与其将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定位于某一两个具体国家，不如定位于来自具体问题领域的多方位挑战。

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明显的战略、政治和安全挑战，但将中国的对外战略建立在“以美为敌”的基础上，既行不通，也不明智。

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明显的战略、政治和安全挑战，但将中国的对外战略建立在“以美为敌”的基础上，既行不通，也不明智。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跟自己最大的经贸伙伴、也是世界经济和军事力量首强之国结为敌对关系，那么就谈不上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从可行性上讲，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愿与中国联手组建长期的反美同盟。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才是两国和世界之福。

与之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还要不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如果要坚持，又如何与时俱进地发展这一思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指在对外工作中既要警惕西方的政治图谋，又要防止同西方对抗，以维护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协调和稳定。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了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在其后20余年里，中国国力大幅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而西方总体实力地位相对下降。于是国内有人提出，“韬光养晦”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应当丢弃，同时代之以更为积极的外交态势，为维护中国权益不惜斗到关系破裂，绝不畏惧对抗。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近年来，特别是在2010年，尽管美国和日本都内外交困，欧盟经济和内聚力也不景气，人们反倒感觉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在增加呢？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从世界政治变迁的深层原因中去找，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中去找。

应当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保留着冷战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盟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着明显优势。发达国家的科技、文化、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和法治环境，是它们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可维持国际优势的基础。部分新兴国家实力的上升，削弱了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分担了西方对中国的压力，但也给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带来了新的难以预见的复杂因素。可以说，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包括西方的不景气

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改善。在国际挑战增加而不是减少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战略思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必须坚持而不能放弃。

然而,坚持这一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如果不能根据20多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这一战略思想进行补充和调整,其精神实质反而难以延续。“韬光养晦”当年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当时是外交工作中压倒一切的重心。但如今,中国外交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复杂的局面、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更多的竞争对手,如果将“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处理与其他新兴国家的关系的指导思想,或是应对金融动荡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不合适的,也缺乏针对性。

为了一方面坚持韬光养晦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避免这一用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在此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是,不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公开的政策宣示,而将其精神更多地表述为“谦虚谨慎”(英文是 modest and prudent)。对内对外,“谦虚谨慎”都不含贬义,而且内涵外延都更为明确,也贴切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在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在对外经济和其他各种业务活动中,在国外旅游、工作、学习中,都应当表现出谦虚谨慎的精神。

第二点建议是,更为准确地理解和表述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戴秉国就此做出的表述是:“中国发展的目标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对内建立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也就是中国首先要对13亿中国人民负责,同时也对世界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使中国发展的成果惠及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他还说:“至于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

但是,有时我们也会听到关于中国发展目标的另一种思路和表述,那就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赶超”理想,比较典型的是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的“超英赶美”。现在,又有人提出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超越美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在一些人心目中,中国人建什么、办什么,都要做到世界最高、最大、最强、最贵、最豪华,实现同“美国梦”一样的“中国梦”,而且不认为“那是神话”。

且不论第二种目标和思路如果得到大张旗鼓地宣传,外部世界将如何对我们侧目而视,就中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地缘条件、经济基础而言,再造一个美国式的超级大国,确实只是神话。现实的国家战略目标,不应该是超越美国,而应该是超越自己。这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国内国际

现实的国家战略目标,不应该是超越美国,而应该是超越自己。这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国内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重质量而非规模,重民生而非政绩工程,重社会公正和谐而非激化矛盾,重实效而非各种各样的世界排名。

两个大局，在国内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重质量而非规模，重民生而非政绩工程，重社会公正和谐而非激化矛盾，重实效而非各种各样的世界排名。

在国际上，中国的目标应当从说“不要什么”演进到说“要什么”；从追求力量的崛起，逐渐演进到通过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世界作出贡献；从追求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市场规模和资源需求的扩大，演进到促进市场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完善；从追求强权世界中的多极化，演进到同世界各国共建法治、公正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式。当中国从人口大国、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演进到和谐大国、教育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时，中华民族的梦想才能真正实现。